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三三九期 ——
(二〇〇三年五月六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305b)

【人物追踪】“文革”中的陈云	胡楠仁
【史海钩沉】周恩来最后的奋起	泯然
【研究报告】“九一三事件”后肯定与否定“文革”的斗争 与毛泽东的心态	陈立旭
【亡灵祭坛】我祈祷，为这段历史的亡灵	周孜仁
【各抒己见】一位当年红卫兵的述说	许志林
【传诸后世】我编《文革书信集》	徐晓
【重建历史】“文革手抄本”与民间阅读	解玺璋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www.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hwxz@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人物追踪】

“文革”中的陈云

• 胡楠仁 •

“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全国之初，身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的陈云，因为身体不好，正在家中休养。实际上从1962年开始，由于党内的“左”倾错误发展越来越严重，他已很少起到党和国家事务的决策作用。但是，林彪、江青、康生等一小撮利用这场大动乱爬上最高权力宝座的野心家，还是没有忘记向他泼来一盆盆的污水，射来一支支毒箭。

第一个起来攻击陈云的是康生。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写出了著名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刘少奇被指责为犯有“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林彪、江青、康生等人群起而攻之。1962年协助刘少奇进行经济调整工作的陈云，也“罪责难逃”。8月13日，康生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华东组小组会上发言说：“陈云同志的思想，也是长期与主席对立的。他以经济专家自居，自认为他的经

济学在主席之上。看看他的1962年的报告，就懂得他的经济学是什么货色。他只讲经济，不讲政治，他讲的经济政策，据我看，只是资本主义的商人经济而已。”会后，由毛泽东批准，未经过正常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名单，陈云位于十一名常委的最后一名。全会未重选党中央正副主席，林彪列常委第二位，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陈云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一起，被实际免去了副主席的职位。随后，炮轰和批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造反活动在林彪、江青等人的煽动下，铺天盖地而来。红卫兵小报上已经喊出了“打倒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修正主义分子陈云”的口号。

当时陈云住在中南海外的北长街，周恩来为了保护他，让他转移到西郊。在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挑动下，一些红卫兵要抄陈云家。中央警卫团一位副团长急忙赶去劝阻，不起作用。红卫兵冲入大门，进到办公室，要搬走保险柜，只是由于警卫的坚决反对，没有搬出大门。陈云很喜欢听苏州评弹，家中保存了一些评弹的唱片和录音，红卫兵说这是“四旧”，也要查抄出去销毁。周恩来知道后，立即派秘书童小鹏赶到现场。童说，周恩来有指示，陈云是中央常委，他的档案不是一般的档案，是党和国家的机密，任何人不许动。至于评弹，是苏州一带的文化艺术，不能作“四旧”破。你们冲进来是错误的，希望你们立即撤出去。但是，红卫兵依仗着有中央文革做后台，硬是不撤。双方僵持了几个小时，童小鹏只好打电话给戚本禹，把周总理的意见告诉他。果然，同样的话从戚本禹嘴中说出，红卫兵就撤走了。以后，陈云的家又被抄了一次，红卫兵还强烈要求把他拉出去批斗。只是在毛泽东、周恩来的保护下，陈云才幸免于难。否则，身体很差的他是无法逃脱这场浩劫的。

1968年8月，根据毛泽东关于让老同志学习、了解“文化大革命”“大好形势”的指示，中央办公厅组织了一批老同志到中央警卫团支左的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北京新华印刷厂等工厂去蹲点调查。陈云被安排到新华印刷厂。同时下去的还有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人。

1968年10月，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又是对老干部的一场高层批斗会。会议一开始，就分组围攻所谓“二月逆流”的老同志，围攻所谓“一贯右倾”的朱德、陈云、邓子恢、王稼祥。这次对陈云猛烈开火的是谢富治。10月17日，在第一小组会上，谢富治说：“我们回想一下，陈云同志在七千人大会上，主席三次叫他发言，他说没调查没发言权，后来不到一个月做了个黑报告反主席、反大跃进、反总路线。”“按陈云同志的报告搞下去，不知成什么样子。刘、邓搞反革命修正主义，朱德同志、陈云同志也是搞修正主义的。‘二月逆流’这些人不死心，还要为他们服务。”谢富治最后总结说：“陈云同志多年不做工作，刘少奇突然抬出他搞经济小组，收拾‘残局’，就是搞修正主义。陈云同志搞些什么，多赚钱、卖花布、炒肉片、高价商品。陈云同志一贯反毛主席，休息也不干好事。这些事情都要清算。”

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林彪、江青集团的主要成员都进入了新的中央政治局，而1931年就担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1934年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常委后一直位于中央领导核心的陈云，第一次离开了中央领导岗位，仅被保留了中央委员的名义。林彪却成为党中央副主席。

1969年10月，中苏即将举行两国边界谈判，根据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有可能急剧恶化，防止苏联利用谈判之机进行突然袭击，特别是核武器打击的估计，中共中央做出了紧急疏散在京中央领导人和老干部的指示，要求这些人在10月20日，即中苏谈判开始以前离开北京。于是，毛泽东前往武汉，林彪去了苏州，朱德、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老帅被安置到京广线两侧的城市，以便打起来可以就地指挥作战。64岁的陈云被通知疏散到江西。同时疏散到江西的还有：邓小平、王震、何长工、萧克、陈再道等。可以看出，这些人大都属于被批判而未被完全打倒的对象。

起初，陈云被告之必须自己买火车票走，不再享受国家领导人应有的公务专厢。由于陈云有心脏病，路上又不安全，经过一再交涉，才同意他与同被疏散到江西的王震合坐一节公务车厢。10月18日，陈云登上火车，隆隆南下。谁知，这一去，竟在江西呆了两年半之久。而制造战备紧张空气的林彪等人几个月后就回到了北京，被他们阴谋打倒的刘少奇、陶铸，到了疏散地不久，即在迫害中含冤去世。

10月20日，陈云到达江西南昌，和王震告别。当天下午，不可一世的江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省军区政委程世清就不打招呼地来到陈云所住的招待所。这个程世清，原是装甲兵政治部主任，因在“文革”初期揭发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而受到林彪的重用，特地调到江西来支左，于是成为江西第一号领导人。在江西，他大搞“清理阶级队伍”和个人崇拜等极左作法，弄得江西人人自危。

程世清见了陈云，根本不把这个前中共中央副主席、当时还未免职的国务院副总理放在眼里。他先是指责陈云过去在领导中央工作时没有把经济管好，发展速度太慢；然后就自我吹嘘说，要在江西掀起一个大跃进和工业革命，让江西这个工业基础较差的省份一年生产六、七万辆汽车，还要做到每年上缴国家100亿斤粮食，全国不再进口粮食。陈云心知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但在当时也不便提出反驳。实际上，江西生产汽车根本没有那么多钢板，全省的粮食产量每年只有197亿斤，如果交给国家100亿斤，全省都要饿肚皮。直到“文革”后的1979年，陈云讲起这件事，还感慨地说：“程世清这些人胆子大，他们说搞什么就搞什么。”

陈云到江西后，周恩来特地打来电话，嘱咐说陈云身体不好，住的地方要有暖气，他过去在北京蹲点是在工厂，这次可以还安排他到工厂。于是，陈云被安排到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蹲点调查，住在离工厂两里路的南昌郊区青云浦干部休养所。青云浦，是院前的一个湖。说来也许是个巧合，陈云出生在上海的青浦区，青云浦恰好由陈云的名字和出生地名组成，不知当时安排住处的江西省革委会是否考虑到了这有趣的一点。招待所是一个用围墙团团包围的院子，门口有武装军人站岗，门牌上写着“福州军区干休所”，江西省军区属于福州军区管辖。陈云住在条件最好的8号院，坐落在干休所最深处，由几间青灰瓦房组成。为了安排陈云，特地由副所长沈云贵带领战士连夜砌了一道3米高的围墙把这个院子与外界隔绝。房间里十分简单，连锅碗等日常用品都没有，要陈云自己出钱派人上街去买。但他的待遇已经比当时也在江西劳动的邓小平要好了。

1969年11月，陈云来到工厂，先参观了各车间、班组。这个工厂有1600多人，原先是属于劳改局的，当时划归江西省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第28团，主要生产化工炼油设备。陈云身穿灰色中山服，黑布鞋，外披一件绿军大衣，走进了厂里。他对工人和干部打招呼说：我是到这里来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的，要向工人阶级学习。他住的地方离工厂有两里路，为了早晨八点钟上班不迟到，他每天六点多就要起床，两年多都是如此。好在上级拨给了他一辆灰蓝色的华沙牌小轿车。

1970年4月24日，中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了由卫星发射回来的“东方红”乐曲声。陈云正好在厂里，他让司机把小轿车的收音机打开，工人们便围过来，倾听那美妙的节奏。有人问：“人造卫星为什么会放音乐？”陈云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却若有所思地说：“其实这颗人造卫星早就应该上天了！”

1970年5月，陈云想了解江西的生产形势，就给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程世清写了一封信，要求到下边的单位去看一看。其后，由江西省革命委员会办事组安排，陈云到江西洪都机械厂、南昌钢铁厂、氨厂、电缆厂、汽车厂等工厂，南昌菜市场、百货公司，南昌第19中学作了参观和调查。还到南昌以外的新余县、萍乡市、南昌县去看了看。在萍乡煤矿，65岁的陈云戴

上安全帽，坐电梯下到几百米的深处，看望了在采煤第一线的煤矿工人。

除了下去调查，陈云在江西最多的时间是用在读书上。他从北京来江西时，带了三箱子的书，其中有：《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全集》、《斯大林文选》、《毛泽东选集》、《鲁迅全集》等。这些书，有些过去读过，这次重读；有些没有读过，这次补上了。

7月，陈云曾短期地回了一次北京。不久，国内形势突变，中共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九届二中全会，原定是讨论修改宪法草案和第四个五年计划，但林彪集团却借机发起进攻，制造出一场新的风波。陈云因为还是中央委员，被通知前去参加。由于身体不好，他便住在山下的九江南湖宾馆，只是召开全体大会和华东组大会时才上山参加。也许因此，他有幸躲开了林彪与江青两个集团的争斗引起的株连。而有不少老同志，因为不了解真实情况，贸然表态，结果又遭到事后占了上风的江青集团的批判。毛泽东发表《我的一点意见》后，形势才开始明朗。9月3日，陈云在华东组大组会议上发言批判了陈伯达，指出陈伯达在历史上就是个伪君子，老虎屁股摸不得，一贯靠几本书吓人，和王明一样。回到厂里，工人们看到报上公布了九届二中全会公报，猜到陈云也去开了会，便请他讲一讲会议精神。陈云摇摇头说：“你们别问我，去问程世清。”这句话不仅是因为程世清是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应该由他来传达；而且也话中有话。程世清是林彪的党羽，在庐山上，他参加了林彪策划的阴谋，会议的内情，程世清当然比陈云清楚得多，确实应该问他。

庐山上的这场斗争一年之后终于有了分晓。1971年9月13日，林彪、叶群等人乘坐“三叉戟”仓皇出逃，葬身于外邦大漠。消息传到基层，已是半个月后的“十一”国庆节之后了。然而作为中央委员的陈云，竟然还是从基层党员干部那里听来的再传达。那天，马骏在厂里听到林彪叛国投敌的文件，急忙骑车赶到陈云住处去，告诉了他。陈云沉思片刻，说道：这个人竟然干出了这样没良心的事。一会儿，他又感慨地说：“林彪比我还小两岁呢！”解放战争时期，陈云和林彪曾在东北共同领导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斗争，可以说，他对这个能打仗、沉默寡言的小个子是有很深印象的。历史发展到今天这一步，真是没有人能预料到。

10月5日起，江西省委召开省委扩大会议，批判揭发林彪的反革命活动。陈云作为在江西的中央委员，也参加了会议。他在会上作了发言，以自己在东北和林彪共事的所见所闻，批判林彪当年在辽沈战役时打锦州的犹豫态度，违背了毛泽东的全盘部署。至于林彪在“文革”中的武装政变活动，陈云在以后才看到印发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并据此进行了批判。而林彪伙同“四人帮”在“文革”中的极左罪行，当时还根本不准触动。8年后的1979年，陈云已经重新进入中央政治局，面临着如何处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问题。他说：“我的看法是，处理‘四人帮’与处理林彪反革命集团要有区别。‘四人帮’这些人祸国殃民，‘文化大革命’10年，干尽坏事。而且在战争年代，他们也没有任何战功。林彪反革命集团则有些不同，他们主要是部队的，像黄、吴、李、邱他们，包括林彪，过去这些人都打过许多仗，也立过各种战功。他们现在犯了罪，应该处理，但与‘四人帮’应该有所区别。”显然，这一评价是全面的、实事求是的。

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对自己的错误有所改正，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相机而动，向他提出了解放大批老干部的建议，得到逐步采纳。一部份长期疏散在外地的老干部的处境开始明显改善，1972年4月，陈云返回北京。

4月20日，一辆蓝色的伏尔加小轿车停在石油机械厂门前，陈云来向与他共事两年半的工人和干部话别。上午，陈云向工厂的负责人谈了近两个小时的意见和建议，他重复了他过去的一贯看法：“工厂就是要搞生产，如果工厂只搞革命不搞生产，我们吃什么？国民经济怎么发展？国家怎么发展……”

4月22日下午，陈云登上了专门为他调来的软卧车厢，一位省革委会副主任陪同他回到北京。显然，陈云的地位和来时已大不相同。4月24日，陈云回到了北京。6天之后，他在国务院的安排下，参加了中山公园举行的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游园活动。但是，他的名字还没有出现在报纸上。6月，应周恩来的要求，陈云参加了国务院业务组的工作。当时，这是一种过渡性的安排。

回到北京后，陈云曾给党中央和毛泽东写过一封信，希望能安排他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每年春季和秋季到下面去做些调查。7月22日，毛泽东批示：我看都可以同意。7月31日，长期不能公开参加国家政治活动的陈云和王震、苏振华、杨勇等老干部出席了国防部庆祝建军45周年的盛大招待会，陈云的名字又以副总理身份出现在报纸上。

从1973年到1974年，陈云协助周恩来进行了外贸工作的领导和研究。两年多里，陈云以他特有的领导艺术和丰富的经济工作经验，提出了一系列带有真知灼见的战略性意见，为我国70年代对外经济工作的新开拓，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60年代末期和70年代初期，世界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着一场大规模的经济危机，商品积压，工人失业，市场萧条。另一方面，原来的社会主义阵营也四分五裂，1969年中苏两国发生珍宝岛武装流血冲突，苏联甚至威胁要用原子弹来对中国实施外科手术式的打击；在东欧，苏联武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引起了其他卫星国的极度不安，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纷纷向美国、西欧靠拢，抵制苏联。这样，原有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实际已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日益增多的经济贸易往来。

在江西两年半之久，并未使陈云成为桃花源中人，他敏锐地看到了世界形势这一变化，同时思索着自身的应变策略。1973年6月7日，他在家中约见刚刚出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陈希愈、副行长乔培新及负责外汇资金的李裕民等人。陈云说：“我是一天打渔一天晒网。”他把工作指作“打渔”，把休息指作“晒网”。陈云既不喜欢打牌、打麻将，也不喜欢跳舞之类的娱乐，平日休息，主要是听评弹录音。陈云问李裕民：“你多大年纪了？”李回答43岁。陈云说：“听了很高兴，30多岁到40多岁，正是干工作的时候。”又问起在延安一起搞过财经工作的乔培新的年纪，然后感慨地说：“你也这么大了，也算老年了！你还可以活20年，我不行了，不过和资本主义打交道是大势已定。”这最后一句话是指当时的国际形势。陈云说：“过去我们的对外贸易是百分之七十五面向苏联和东欧国家，百分之二十五面向资本主义国家。现在改变为百分之七十五对资本主义国家，百分之二十五对苏联、东欧。”他还说：“这个趋势是不是定了？我看是定了。因此，我们对资本主义要很好地研究。不研究资本主义，我们就要吃亏，不研究资本主义，就不要想在世界市场中占领我们应占的地位。”他幽默地说：“列宁讲过：到共产主义时代，会用金子修一些厕所。我看，现在离那个时代还很远。”

这些话，在改革开放已经进行十几年后的今天看来，是毫无疑问的真理，然而，在当时，却如石破天惊，振聋发聩。人们刚刚从一场“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批判资本主义道路”、“消灭资本主义尾巴”的狂风暴雨中走过来，外贸领域的干部几乎是谈“资”色变，进口外国商品必须供批判用，出口商品必须支援世界革命。所以，外贸活动几乎降到了最低限度，极左作法充斥其间。一年一度的广州交易会虽然还在进行，却是只邀请“左”派商人前来，交易之前，首先赠送毛主席语录、像章，高呼革命口号，如果外国人能遵守这些政治要求，我方在交易中则可不计较价钱，甚至奉送，美其名曰“精神变物质”。有的狡猾商人来到中国，装模作样，好话说尽，骗得利润到手，回去把中国货上的工农兵商标换成大美人，加价抛向国际市场，大赚其钱。还有的外国“左”派自己就打成一团，乘坐同一架飞机来中国，一派从前门下，另一派

从后门下，互不理睬，还要中国向他们做思想工作，促进“大联合”……在这样的形势下，陈云竟然提出要以资本主义国家为主要对象进行贸易，还要很好地研究资本主义，确实让人为他的胆略感到钦佩，又为之捏着一把冷汗。

这次谈话中，陈云还提出了要研究资本主义的10个具体问题：如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发行量、黄金储备量、美元分布、基本建设投资总额、赤字等，并且要求银行研究西方领导人尼克松、康纳利、德斯坦、舒尔茨等的讲话、文章，以利用外资。有人担心这样做是否符合自力更生方针，是否符合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精神。陈云尖锐地指出：“首先要承认是不是好事，只要是好事，你们就可以找出一个办法——一个变通办法来让大家讨论。”“要把一些界限划清楚，如不要把实行自力更生方针同利用资本主义信贷对立起来。”至于这样做是否符合那些“文革”带来的极左教条，陈云旗帜鲜明地说：“凡是存在的东西都有理由，是不是合法是另一回事。我们做工作不要被那些老东西束缚住，当然这可能会犯错误，但是谁不犯错误？”

从陈云家中出来，陈希愈等人十分激动，决心以此为指导思想，打开利用外资的突破口。1973年，中国人民银行积极开展了筹措外汇和利用外资的工作，一年中筹措到10亿美元，这在一年引进几百亿的今天只是一笔小数目，然而在当时却是个了不起的成就。

1973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批准了国家计委提出的引进价值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方案，即后来人们常说的“四三方案”。其中包括：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纤，3套石油化工，10个烷基苯工厂，43套综合采煤机组，3个大电站，武钢一米七轧机，及透平压缩机、燃气轮机、工业汽轮机制造厂等项目。这是中国工业发展急需的一批关键设备，有的“文革”前就准备进口，但“文革”一来，江青一伙挥舞极左大棒，把进口设备批成“投降卖国”，无人再敢建议。直到林彪垮台后，有关部门才又旧事重提。但张春桥却说：一米七轧机上海工人阶级自己能造，不用进口。然而，上海工总司的王洪文、陈阿大等一群造反起家的打手们，根本不懂技术，又压制技术人员，闹了一年多，连个轧机的影子也没见到，钢铁工业的发展被他们一误再误。于是，周恩来、李先念再次布置国家计委申请进口，毛泽东很快予以批准。同年，还批准进口美国彩色显像管成套生产线技术。江青等人又跳出来，横加指责和破坏。

1974年2月，四机部有个技术员给江青写信，“揭露”出国谈判引进彩色显像管生产线的中国代表团接受了美国康宁公司赠送的玻璃蜗牛礼品，是甘心让外国人侮辱我们“爬行”。江青如获至宝，气冲冲地赶到四机部，发表一通讲话，说美国康宁公司送玻璃蜗牛是“侮辱我们，说我们爬行”，要求退回，并强烈抗议。周恩来指示外事部门经过调查，弄清玻璃蜗牛是美国人常用的一种礼品，立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并通过决定，收回江青的讲话。但经过“四人帮”的一闹，这个彩色显像管生产技术的引进被耽搁了好几年。原本在引进报告上签了字的王洪文，这时也随着江青把脸一翻，说向外国买船是“迷信外国资产阶级的假洋鬼子”，是“修正主义路线”。面对压力，协助周恩来进行引进工作的陈云没有退让，反而要求在引进轧机时把眼光放得远一些，连同必须的附件、备件一起进口。他说：这套轧机“如果缺了零配件，国内解决不了，就要推迟投产，耽误一年就少生产钢板300万吨，很不合算”。针对“四人帮”不顾国家和人民利益抛来的“洋奴哲学”大帽子，陈云愤而拍案而起，坚定地说：“如果有人批评这是‘洋奴’，那就做一次‘洋奴’！”

过去，外贸部门在国际市场上购买国内急需物资时，常常是直接购买现货，外国资本家一看到订单，就大幅度抬价，使我们吃了不少亏。在陈云指导下，外贸部门开始利用国际期货市场的商品交易所。如一次，他们接受了购买砂糖4.7万吨的任务，先不购进现货，而是购进2.6万吨期货，再购买4.1万吨现货。待到交易市场上得知中国购买消息，砂糖价格上涨，外贸部门再抛出多余的期货。这样，不但顺利完成了采购任务，而且还为国家赚取了240万英镑的外汇，陈云总结这次经验说：“国际市场上的交易所是投机商活动场所，但也是一种大宗商品

的成交场所。”“对于商品交易所，我们应该研究它，利用它，而不能只是消极回避。”还指出：“在今后两年里对交易所要认真进行研究。”今天，中国不仅全面参加了国际商品交易中的期货市场，而且有了自己的商品交易所和期货市场。回溯当年在极左思潮猖獗，人们不敢谈也不知道期货市场还可以为社会主义国家服务的时刻，我们不能不为陈云表现出的胆识和远见而钦佩。

在周恩来、陈云和随后复出的邓小平的共同领导和努力下，1973年至1975年，我国对外经济工作开拓出一个新的局面，形成了自1954年引进苏联156项援助项目后的第二次引进高潮。这一期间引进的重要成套设备，到1982年全部投产，成为80年代中国经济大发展的生力军。

但是，当时中国还没有从“文革”的阴云下得到解脱，“四人帮”还控制着较大的权力，极左错误仍然占据着统治地位。1975年11月，“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迷雾再起，于1976年达到高潮。邓小平被迫离开了中央领导岗位，他和陈云等人进行的纠“左”努力也遭到批判。张春桥、王洪文等人立即指使在人民日报社的爪牙，派出大量记者前往各个部门搜集材料，攻击陈云、万里、胡乔木、张爱萍、周荣鑫等复出的领导干部。张春桥说，陈云主管的外贸部“问题严重”，“在外贸工作上执行的是一条卖国投降主义路线”。陈云痛心地看着费尽心血才有所好转的经济形势又毁于一旦，同时也作好了再次被送到基层去“蹲点”的精神准备。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与世长辞。“四人帮”更加肆无忌惮地把手伸向了最高权力。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人开始考虑除掉这个根植于“文革”动乱的毒瘤。叶剑英请王震找陈云商量。当时，可供选择的只有两个办法，一是召开中共十届三中全会，用合法手段把“四人帮”搞下去；另一个是采取特殊手段把“四人帮”抓起来。陈云在家里反复研究十届中央委员会名单，算来算去，觉得没有完全的把握。叶剑英主张武力解决，并派人请陈云前往他在西山的住所面谈。当陈云得知叶帅的坚定态度后，明确表示：这场斗争不可避免。

粉碎“四人帮”后，陈云在1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不顾华国锋设置的“两个凡是”的障碍，坚决主张让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以后，又在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了为薄一波、陶铸、彭德怀等冤假错案平反和清算康生罪行等关键性的意见。在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努力下，中国终于走上了重整河山的正轨。在历史的激浪狂飙中，陈云以他岿然不动的信念，给人们留下了中流砥柱般的高大形像。

□ 原载《纵横》杂志1996 / 11

【史海钩沉】

周恩来最后的奋起

• 泯 然 •

一九七三年，周恩来被确诊得了膀胱癌。癌症可以使一个人完全消沉，失去生存的勇气和意志，也可以激发出人无所畏惧的精神，干出以往想干而不敢干的事情。周恩来无疑属于后者。

一九七三年底，毛泽东发起了“批林批孔”运动。毛泽东搞这场运动的深层目的就是要整倒周恩来。在林彪垮台后，周恩来实际成了中共第二号人物，这也是中共党内一大批老干部和广大群众当时乐于见到的局面。周恩来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负责处理日常工作，他利用毛泽东的一些讲话，不失时机地开始批“左”。毛泽东敏感地意识到，周恩来企图否定文化大革命。

命中的一些做法将导致大批干部群众由对文革的心怀不满进而走向公开否定文革，这部份人会吧周恩来做为的一面旗帜与他分庭抗礼，于是毛泽东开始向周恩来发难。毛泽东先是直接了当地否定了周恩来批“左”，完全不顾事实，说林彪一伙是“极右”。一九七三年七月，毛泽东又在周恩来所送的外交部一份报告上批到：“总结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搞修正。”同年十二月，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八大军区司令对调，让邓小平兼任总参谋长，但仍不忘影射周恩来，批道：“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江青一伙更是充当了毛泽东向周恩来发难的急先锋。一九七三年，周恩来力图整顿教育，恢复大学招生，特别是希望恢复由高中生经过高考直接升入大学的制度。“四人帮”利用他们掌握的宣传工具，树立了“白卷英雄”张铁生，而后又搞出了“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把一个小女孩黄帅捧成了“反潮流”英雄。

一九七四年一月，毛泽东批发了“一九七四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转发了江青等人搞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批林批孔”运动正式开始。

这里有一个小插曲。一九七三年十一月，江青在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诬指周恩来想要迫不及待地代替主席。毛泽东知道这件事后，反说：“不是总理迫不及待，是她（指江青）迫不及待。”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四日和二十五日，江青在北京连续召开的驻京部队，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万人动员大会上发言，矛头直指周恩来，但毛泽东压住了江青的讲话录音，不许在全国播放。许多人以此来证明毛泽东不满江青一伙对周恩来的攻击。其实，毛泽东是不满江青过于急躁，打乱了他的部署。毛泽东内心深处是希望看一下一九七三年复出的邓小平，邓对周的态度对毛泽东来讲太重要了。周恩来病重，毛泽东发现周围竟无人可接替周恩来，于是决定启用邓小平。毛泽东说邓小平“人才难得”并非溢美之词，而是一句实话。能够象周恩来一样，经济，外交，军事一把抓的人只有邓小平。但毛泽东希望邓能够 and 周拉开距离，不要搞到一起。这就是一九七三年底为什么毛泽东一面要邓任总参谋长，又同时批评周恩来的原因，他给邓小平的信号再明显不过了。此时的毛泽东知道他发起一场运动远不像他发起文革，搞掉刘少奇、邓小平那样得心应手了，那时，他左有林彪，能够压住军队的阵角，右有周恩来，能够把全国大动乱控制在他能够容忍的范围内，如今，他身边已无现成的“栋梁之材”，他必须找到一个人能够代替周恩来，但又不能够和周搞在一起，“批林批孔”运动能够起到“一石二鸟”的作用，一方面整倒周恩来，一方面考察邓小平是否能够真正为他所用。毛泽东知道，达到这样的目的只能智取，有进有退，江青如此不讲策略，只知急攻周恩来，势必坏了大事。

但使毛泽东始料不及的是，周恩来此次以超乎寻常的勇气奋起抗争。

一九七四年，周恩来已经病入膏肓，住入医院，但他坚持到底，不离开工作岗位，继续过问党，政，军日常工作，在医院里频繁接见外宾。九月三十日，周恩来突然出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五周年国庆招待会上，全场沸腾，掌声雷动。周恩来一改过去小心翼翼，避免招摇的作风，要毛泽东和江青一伙看到党心民心所向。

“批林批孔”运动一开始，周恩来避虚就实，他一方面表示要跟上毛泽东的“战略部署”，一方面对江青一伙抛出的大量批“周公”，批“孔老二”的材料和文章基本置之不理，对影射他的所谓“儒法两条路线斗争”不予回应。反之，周恩来把重点放在“批林”上，特别抓了军队和国务院系统高级干部的“批林批孔”，要他们揭露林彪一伙的罪恶活动，抛出大量揭露林彪一伙的材料。谁都知道，林彪集团和江青在文革初期关系密切，周恩来就是要人们记住这一点，特别是告诫老干部，只要江青在台上，你们永无宁日。

“批林批孔”运动进行过程中，周恩来一反常态，利用“四届人大”召开在即的机会，以罕有的积极性过问人事安排。周恩来与毛泽东共事几十年，深知毛泽东最忌“大臣谋权”，五十

年代的“高饶反党集团”就是栽在这个上面。周恩来在党，政，军关键位置的人事安排上从来不多嘴，基本上是按毛的“旨意”加以执行。但这一次周恩来几乎不避嫌疑，频繁地在医院找党、政、军高级干部谈话，商量人事安排。江青一伙看出了异常，匆忙中派王洪文到长沙向毛泽东告状。那时周恩来有一句名言：“不能把权力落入他们（指江青一伙）手里。”

周恩来同时也看穿了毛泽东利用“批林批孔”试图“拉邓倒周”的把戏。在周恩来处境困难的时候，邓小平一路迁升，到了一九七五年初，他已经是党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常务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毛泽东对邓小平在一九七四年的表现是满意的。邓小平没有去刻意维护周恩来。例如，邓小平在江青一伙利用“批林批孔”运动猛批当时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时，首先提出要李辞去中共中央副主席一职。谁都知道李德生与周恩来关系密切，在林彪集团垮台后，李德生成为周恩来在军队中批判“极左”，解放高级干部的主要助手。然而，周恩来没有因此而“疏远”邓小平，反而对邓小平采取了更为放手的办法，对他的工作基本不过问，而且全力支持，更向毛泽东提出由邓接替他，顺水推舟，打乱了毛泽东想再看一下邓的表现的时间表，也使邓小平在思想准备不足的情况下一下就站在了最前面，直接面对江青一伙。周恩来深知，以邓的为人，可能不买他周恩来的帐，但也决不可能任由江青颐气指使。一九七四年十月，邓小平和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终于爆发了公开冲突，即所谓“风庆轮”事件。周恩来坚定地支持了邓小平。江青一伙找了毛泽东。这时毛泽东试图“拉邓倒周”的部署已经被周恩来破局。毛泽东对江青大加斥责，因为江青一伙完全不理解他的深意，把唯一能够抗衡周恩来的“人选”彻底得罪了，而且使邓小平如同叶剑英一样，坚定地站在了周恩来一边。应该讲，周恩来棋高一招。

由于周恩来超乎寻常的奋起抗争，“批林批孔”运动搞了个“虎头蛇尾”，不了了之。周恩来的抗争使他的威信在生命最后一刻达到了顶峰。毛泽东意识到“反周必乱”，不得不维持现状，在一九七五年召开的“四届人大”上让周恩来继续任总理。周恩来自己没有预料到的是，他的这次抗争使他真正成为了那个时代反对江青一伙的一面旗帜。一九七六年清明节，广大干部群众正是以悼念他的逝世，向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发出了公开的怒吼。那时的人们要找“四人帮”清算的第一笔帐就是他们反对周恩来。自然，随着周恩来在“批林批孔”运动后威信骤然上升，毛泽东在文革中树立起的绝对权威在人民心目中开始急剧下降。

~~~~~

## 【研究报告】

“九一三事件”后肯定与否定“文革”的斗争与毛泽东的心态

• 陈立旭 •

震惊世界的“九一三事件”是我党历史的重要转折点。“九一三事件”的发生，惊醒了世人，启发人们对“文化大革命”进行深入思考，怀疑和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思想也就势所必然地出现了。于是在中国共产党内展开了一场肯定与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斗争。毛泽东对待这场斗争有复杂的心态，在当时党内生活不正常的环境下，他基于复杂心态作出的举措，又对这场斗争的结局产生了出乎他意料之外的影响。在时过二十多年的今天，回过头去研究这段历史，对于全面了解我党历史和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有意义的。

## ◇ 震惊后的思索

1971年9月13日，林彪折戟沉沙使全党震惊、全国人民震惊。同年9月18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随后，中央决定将通知扩大传达到地师以上党委。10月6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林彪集团罪行的通知，此后又下发了一

系列有关文件，“批林整风”运动逐渐在全国展开。

中央文件的下发和“批林整风”运动的展开，启发人们思索。从普通百姓到高级干部、从军队到地方，“九一三事件”一时成了热门话题，种种议论和猜测又加深了人们的思考。当时人们思索的主要问题是：（一）林彪是毛泽东的战友和载入党章的接班人，竟然要谋害毛泽东，另立中央，可见毛泽东选人也有错误。（二）“九一三事件”来得那么突然，人们对所谓“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竟毫无察觉，可见“路线斗争不可知”。（三）林彪是参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人物，又是“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支持者，他竟在“文化大革命”中叛党。因此人们开始怀疑“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性。（四）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担任重要领导职务，许多事情是在他指挥下干的。他叛国后，人们开始对“文化大革命”中打倒老干部，“踢开党委闹革命”，把毛泽东神化，把毛泽东思想教条化的做法持怀疑态度。

上述思索加上对“文化大革命”恶果的直观感受，使人们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发生了变化。由忠诚的信仰逐渐变成怀疑，狂热的情感逐渐变得冷淡。尽管限于当时的环境，人们不能公开说出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话，但可以肯定，在深思林彪事件和回顾“文化大革命”历程后，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已经在许多人的头脑中产生。

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与人民息息相通的周恩来总理，通过对林彪事件和亲身经历的“文化大革命”的思索，已经对“文化大革命”持否定态度。限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和他的处境，周恩来也不可能公开说出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话。但他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在他“九一三事件”后相互联系的政治活动中表现得十分清楚。

#### ◇ 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方式

周恩来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重要是通过批“极左”体现出来的。他认为林彪集团的实质是“极左”，而“文化大革命”是“极左”的产物。因此他批“极左”的实质就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否定。批“极左”，可以说是代表了周恩来当时的政治主张。他在“九一三事件”以后的一切活动，都贯穿着纠“左”这一基本精神。周恩来当时实际上是全党全国人民中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人们的主要代表者，而此次否定“文化大革命”又是1967年2月前后中央许多领导同志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这一正确主张的继续。

从1971年9月到1972年秋，在批判林彪的过程中，周恩来先后在全国计划会议、公安工作会议、出版工作座谈会、科学工作会议、卫生工作会议等许多场合，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批判无政府主义。他始终坚持通过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来消除林彪一伙对经济工作的破坏性后果。他在一次会议上对“极左”作了界定：“极左”思潮就是搞“空洞的、抽象的、形而上学的东西，夸夸其谈，走极端”。1972年4月9日，周恩来在广州观看部队文艺演出时说：“极左思潮不肃清，破坏艺术质量的提高。你们的歌越唱越快，越唱越尖，越唱越高。革命激情要和革命抒情结合，要有点地方色彩”。1972年5月21日，周恩来在有312人参加的中央各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议上发表讲话指出：林彪在1966年5月18日关于政变的讲话是“极左”的。在72年6月10日、11日、12日的会议上，周在讲到民主革命时期党内二次路线斗争时，专门讲到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对我党的危害，提醒全党注意“左”对党的事业的破坏。同年7月14日，周恩来根据杨振宁的建议，指示北大周培源纠正科研、教育中的“左”倾错误，注意理科基础理论水平的提高。8—9月间，周恩来两次指示《人民日报》的同志在机关内部批判“极左”思潮。10月14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等三篇文章，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

为了在实际工作中纠“左”，周恩来抓了四件大事：一是解放老干部。1972年4月周恩来指示《人民日报》起草一篇正面阐述党在干部问题上的历来政策和优良传统的社论，并亲自审改了这篇题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社论。社论在4月24日《人民日报》上发表后，在全国反响很大。各地开始重新考虑落实干部政策问题。此后，周恩来作出许多批示，起用大批老干部。在他的亲自关怀下，陈云、王震、滕代远等一大批老干部获得“解放”。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卫生部组织北京十大医院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给近500名副部长以上的干部作体验，并在这个名义下获得“解放”，重新工作。二是恢复经济秩序。1971年11月至1972年1月，在周恩来的支持下，中央连续发出《关于严格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制止年终突击花钱的通知》、《关于调整部份工人和工作人员工资的通知》、《关于改革临时工、转换工制度的通知》、《1972年全国计划会议纪要》、《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指示》，整顿企业，加强管理，恢复被砸烂的规章制度，强调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1973年2月26日，周恩来在听取《坚持统一计划、整顿财经纪律》（即经济工作十条）起草情况汇报时，专门作出了恢复经济秩序的重要指示，并明确指出：“整顿的方针要写清楚”。经一年多的整顿，国民经济在恢复中有所发展。三是恢复教科文部门的正常工作。在周恩来的亲自关怀下，大批科技人员从五七干校调回北京，重新走上科研岗位，各大学的教学秩序也有所恢复，一批专家被派出国考察，一些被批、被封的优秀文艺作品也重新面世，还新产生了一批歌颂工人、农民的好作品。四是打开外交工作的局面。继我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许多国家与我国建交。特别是1972年2月和9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和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先后访问我国，从此打开了我国与西方联系的大门。

周恩来上述纠“左”主张和实际努力，就是要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其基本精神，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尽管这种否定不是以公开的方式，而是通过在实际工作中体现基本主张的特殊方式进行的。但仍然引起了“四人帮”的注意，并受到他们的强烈反对。

#### ◇ “四人帮”的反击

“四人帮”的成员都是靠“文化大革命”发迹的，“四人帮”的形式也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可以说“文化大革命”是“四人帮”的生命。他们不允许任何人否定“文化大革命”，要竭力维护“文化大革命”这面“旗子”。他们看出周恩来批“极左”的主张和纠“左”的努力基本精神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因此对之十分仇视，并立即作出反击。1972年10月6日，《光明日报》发表周培源根据周总理的意见写的文章：《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之后，张春桥、姚文元都指使上海《文汇报》攻击这篇文章，并且要追查周培源的“后台”。10月14日《人民日报》刊登《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等三篇批“极左”的文章后，张春桥、姚文元指使上海《文汇报》召开工人座谈会，假借工人群众的名义，整理了一个材料上报，说工人不同意批“左”的文章。张春桥、姚文元又在《人民日报》内大批所谓“修正主义”、“右倾回潮”。同年11月，中联部、外交部在一份报告中提出“彻底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周恩来11月30日批示：“拟同意”，张春桥却于12月1日写道：“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否仍然是极‘左’思潮？批林是否仍然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我正在考虑。”江青于12月2日写道：“我个人认为应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同时批他在某些问题上的形左实右。在批林彪叛徒的同时也应着重讲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四人帮”维护“文化大革命”的政治主张是十分明显的。

“四人帮”维护“文化大革命”主要采取了两个措施。一是发动批林批孔运动。早在1969年10月，张春桥就提出过批孔问题，并组织人撰写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孔家店的反动》一文。虽后来张春桥认为“现实性不强”而把它搁置起来，但可以看出当时张春桥就认为批孔是维护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重要前提。“九一三事件”之后，专案组在林彪的住处发现了一些林彪肯定孔子、孟子某些言论的条幅，上报毛泽东后，毛泽东想到了批孔。

1973年春，毛泽东在一首诗中批评郭沫若尊孔。5月间，中央工作会议传达了毛泽东关于要批孔的意见。7月4日，毛泽东在同王洪文、张春桥谈话时又提到林彪是尊孔反法的。8月5日，毛泽东公布了他写的《读〈封建论〉一呈郭老》一诗，7日，他又批发了杨国荣教授的一篇批孔子的文章。毛泽东当时是把孔子思想作为林彪思想体系的一部份来看待的，基于这一看法，他同意批林批孔。“四人帮”把批林批孔作为维护“文化大革命”从而维护既得权力以攫取更大权力的手段，因此他们在批林批孔问题上甚为积极。1974年1月12日，王洪文、江青在致毛泽东的信中推荐了北大、清华汇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毛泽东批道：“同意转发”。1月18日，中共中央将北大、清华汇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作为中央1974年第1号文件下发，从此“批林批孔”在全国展开，“批林批孔”的目的，是通过批林彪的所谓极右，维护“文化大革命”。这一点在批林批孔全面发动的1974年初发表的一些文章、社论中说得最为清楚。当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元旦献词》中说：“国内外一小撮阶级敌人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说明这场革命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我们一定要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批林，批判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就是批判修正主义。我们要充份利用林彪这个反面教员，向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反修防修的教育。要重温毛主席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吸取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2月1日《红旗》杂志在短评《广泛开展批林批孔的斗争》中说：“只有通过对孔孟之道的批判才能进一步认清林彪反党集团搞复辟倒退的反革命罪行及其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才能挖出林彪反动思想的老根，清除林彪和孔子的反动思想影响，也才能进一步认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以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2月2日、20日《人民日报》接连发表题为《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批克己复礼——林彪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纲领》两篇社论指出：批林批孔“要联系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坚持革命、反对倒退，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满腔热情地支持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要批判林彪反党集团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妄图复辟修正主义那一套罪行。”

二是借助毛泽东的错误。毛泽东错误地认为林彪集团的反动实质是极右，不同意批“极左”。1972年12月5日，人民日报社王若水给毛泽东写信说：“今年8月1日，总理在一次谈话中指出：人民日报等单位，极‘左’思潮没有批透；‘左’的不批透，右的东西也会抬头。我很同意总理这个提法。总理讲的是机关内部的运动，但我觉得对报纸宣传也是适用的。”他在信中还反映了张春桥、姚文元不同意批“极右”。12月17日，毛泽东对张春桥、姚文元说：“批极左，还是批极右？有人写信给我，此人叫王若水。”“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对。是极左？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毛泽东的意见迅速传达到全国，此后，就只准批林彪集团的“极右”，不准再批“极左”了。毛泽东也注意到党内人民群众内有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倾向，因此他重提防止修正主义的问题。1973年12月21日，他在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同志的讲话中提出：“如果中国出了修正主义，大家要注意啊！”“《水浒》不反皇帝，专门反对贪官。后来接受了招安。”这期间毛泽东还多次发表肯定秦始皇和批儒评法的言论，这是针对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思潮的。他这些错误，一方面为“四人帮”反击否定“文化大革命”思潮提供了最尖端的武器，另一方面也为后来“四人帮”搞影射史学提供了方便。

#### ◇ 毛泽东的两种心态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要通过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消除国家和社会的弊端，创立一个独树一帜的社会主义，挽“修正主义”狂澜之阮例。因此毛泽东一直坚持认为“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并将此称为他一生中干的两件大事之一。他不能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形式对“文化大革命”加以否定。而以周恩来为代表的

广大干部群众，对“文化大革命”是坚持不公开的否定态度的，当否定“文化大革命”与维护“文化大革命”斗争激烈交锋之时，毛泽东当然站到维护“文化大革命”一边，反对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思潮。正因为如此，他才同意批林批孔，并通过批林批孔、批儒评法、评《水浒》等方式维护“文化大革命”。另一方面，毛泽东也看到了“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破坏。“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对这方面看得更多，他不能不考虑解决“文化大革命”破坏后果的问题。他支持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工作，支持周恩来恢复经济秩序和打开国门的一切举措，还亲自为许多老干部平反，起用邓小平担任党、国家、军队重要领导职务。他对“四人帮”的活动有觉察，进行了批评，并指出他们在搞“上海帮”。但是应当指出：毛泽东的上述工作只是在总体上维护“文化大革命”前提下对“左”的错误的局部纠正，不可能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既要维护“文化大革命”，又要修补“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破坏，是当时毛泽东的心态。

在相互矛盾的心态影响下，毛泽东采取一些相互矛盾的举措。他既支持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支持周恩来“解放”一大批老干部，使大批老干部重新回到领导岗位上来，同时又继续重用“四人帮”，让张春桥、王洪文当政治局常委，并把王洪文放在接班人的位置上。其二，他在具体工作中，既批评“四人帮”，也批评周恩来。他批评“四人帮”搞帮派，批评江青有野心，但他根据不可靠消息，误认为周恩来在一次外事活动中说了错话，并且要政治局开会批评周恩来。其三，他试图调和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党内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健康力量与“四人帮”的矛盾。他安排张春桥当国务院副总理，与周恩来、邓小平一同工作。他让王洪文与周恩来共同筹备四届人大。1974年，周恩来、王洪文一同赴长沙向他汇报筹备四届人大的情况后，他让周恩来与王洪文留在长沙谈谈。他称赞邓小平“人材难得”，同时也夸奖张春桥“有才干”。

毛泽东没有想到“四人帮”与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健康力量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当 he 从前述的矛盾心态出发，试图调和两种力量之间的矛盾未能奏效时，他对这两种力量都感到失望了。

#### ◇ 寄希望于“第三种力量”

毛泽东在对上述两种力量均感到失望之后，开始在保留两种力量的情况下，开始寻找“第三种力量”，寄希望于“第三种力量”，使其逐步取代上述两种力量。

基于毛泽东既要全面肯定“文化大革命”，又要去除“文化大革命”破坏性后果，沿着斗、批、改的步骤达到天下大治的思路，他寻找“第三种力量”除了当时党章公开规定的接班人标准外，还要有如下几个基本条件：第一，他们必须是拥护“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维护“文化大革命”这条路线，经过“文化大革命”考验的。第二，他们具有某种务实精神，能够在“抓革命”的同时“促生产”，是能够在恢复国民经济中起作用的。第三，他们与老干部和新干部（指“文化大革命”中提拔起来的年轻干部）都能共事，但又同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健康力量与“四人帮”都没有历史联系，他们只忠实于毛泽东及其路线。

在这一指导思想下，毛泽东迅速起用华国锋等一些干部担任党政等重要领导职务，同时选拔一些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干部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起用一些过去长期做经济工作的领导干部担任国务院副总理。1976年4月5日天安门事件后，华国锋成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毛泽东试图让以华国锋为代表的“第三种力量”接班的意图是明显的。

但是毛泽东是在把“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力量和“四人帮”都保留在党中央内的情况下扶持第三种力量的，这不可能消除党内斗争。在他逝世后，这场斗争终于白热化了。

在毛泽东逝世后，有极大政治野心的“四人帮”一方面对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力量仍恨之入骨，急欲除去而后快，另一方面对以华国锋为代表的第三种力量担任党和国家主要领导职务极为不满，急欲取而代之。他们要煽动更大的动乱，试图乘乱夺权。他们积极准备在上海发动暴乱，在北京也上下活动，制造夺权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以华国锋为代表的第三种力量和党中央内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力量，一方面为了维护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另一方面也都感觉受到了威胁，于是代表党和人民的意志，一举粉碎了“四人帮”。

我们回过头去客观地分析这段历史，就不能不承认：毛泽东在自相矛盾的心态影响下，在调和党内两种力量之间本不可调和的矛盾失败之后，扶持第三种力量，是有重大历史影响的。第一，毛泽东没有把权力交给坚决执行“文化大革命”路线又有极大政治野心的“四人帮”，而是交给了第三种力量，而这第三种力量虽也拥护“文化大革命”，但那是认识上的错误，与“四人帮”有本质的区别。这从客观上为我党纠正错误，提供了缓冲条件。第二，毛泽东在周恩来逝逝，邓小平解职后，并未在党内搞大规模清洗，相反他保留了叶剑英、李先念等一大批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领导人继续在中央担任职务，这客观上为后来我党健康力量代表党和人民意志一举粉碎“四人帮”创造了条件。基于此，我们应当肯定：毛泽东晚年时对“文化大革命”的两种心态及在这两种心态下的举措，虽未达到毛泽东原来的预想，但却在客观上为我们党和国家依靠自身力量纠正错误从而走上正轨创造了条件。

□ 原载《毛泽东思想研究》(成都) 1996 / 01

#### 【亡灵祭坛】

我祈祷，为这段历史的亡灵

• 周孜仁 •

差不多过了整整一个半月，一位远在深圳的年轻朋友才非常热心地给我打来电话（电话打了将近两小时！）。他要我查一查《南方周末》关于重庆沙坪坝红卫兵公墓的文章。他说我应该是那一段历史的见证人。他曾听我讲过1967年8月关于重庆的故事。他相信我把那段经历写出来一定非常震撼人心。

没错。我确实是从那个血雨腥风的荒唐年代走过来的。走得风风雨雨、遍体鳞伤，最后终于走得圆熟豁达、与世无争。但接到电话那一晚，沉睡的心却无法平静。打开电脑，我搜遍《南方周末》网站，终于在四月十九日的《解密》中找到了它：那一座被蔓藤荒草尘封的墓地、以及和墓地联在一起的故事，甚至还有那些个我至今记忆犹新的名字。

应该是十七年前的事情了。我去重庆公差，那位在重钢担任工程师而当年曾在重庆文化革命中九死一生的大学同学非常郑重地问我：你还记得沙区公园旁边那片公墓吧？我说当然。815派的数百武斗死者不埋在那儿吗？炮火连天的1967年夏天，公墓草成时，我曾经去过多次的：毒日头下一根根高高低低石柱墓碑，石柱上刻满呼唤年轻人献身的诗词豪言。类似的公墓，在我的母校——重庆大学的松林坡上也有一座：下面埋着31位不应该如此早逝的学生的灵魂——只是后来“消除文化大革命痕迹”，校方已断然将它铲除得荡然无存。我自然问到沙区公园地下那400多具亡灵。

我的朋友凄然一笑。他说巧得很，因为那儿埋的人太多太杂，规模又庞大，公园根本就拿出那么多钞票去消除这个“痕迹”。再说，墓地和死者单位离得远远的，眼不见心不烦，谁愿意花钱去犯家属的众怒？于是修一院围墙圈起来完事——一个奇特的历史景观便这样幸运、这

样莫名其妙地被尘封在闹市中一片寂寞的荒林中间了。

于是，在1984年夏日的那个午后，我和我的朋友在密雨中造访了这片荒园，看到过可敬的《南方周末》的记者描写的场景。只是我相信，墓地无人修葺，自生自灭，记者所看到的，定然比十七年前我所看到的更苍凉。岁月如斯，记者感受到的，比十七年前我所感受的，也定然更加深邃。

记得那一天回到宾馆，我写了一首诗，还萌动许多乱七八糟的想法。我曾想，荒林底下这些亡灵，他们所体现过的英雄主义和献身精神，难道不是从他们光荣的前辈：从董存瑞到雷锋、从刘胡兰到江姐那儿继承而来吗？而正是这样的英雄主义和献身精神开辟了我们革命胜利的道路，守护了共和国神圣的摇篮。我在想，如果祖国给他们一捆炸药包，他们难道不同样能够到隆化的碉堡下义无反顾地和敌人同归于尽？如果祖国给他们一面红旗，他们难道不同样能够强渡大江，去攻占敌人的总统府？很可惜，那个时代偏偏给了他们一尊神象！能怪他们吗？他们莫名其妙地死去了，如果不是上面说的那些莫名其妙的原因，也许，他们也和重庆大学松林坡上那些冤魂一样，早就被“消除了痕迹”。谢天谢地，世界上总还有这些莫名其妙的理由，让真实的历史保留下来了。

读了《南方周末》记者的文章，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松了一口气。1984年那个夏日的午后，我曾为这可怜的墓地深深地担忧过，就象小心翼翼呵护一件古瓷，我真怕有人轻轻一击，便将它打个粉身碎骨。谢谢《南方周末》！谢谢它带给我们如此让人宽慰的消息！

是的，既然是历史，我们有什么必要去“消除痕迹”呢？你可以站到面前去，为他们的崇高而肃然起敬；可以为他们的愚昧而心中窃笑；也可以什么都不为，就在那儿低徊沉思。你就是不要去消灭它：虽然就是这么一片荒坟，一片衰草——因为消灭历史总是徒劳的。

于是我祈祷：把它留下吧，不要去改变，不要去修葺，不要去装饰，就这样，和历史一样真实、一样凝重。如果因为朋友的喋喋不休而让我们实在下不了结论，那就留给孩子们，我相信他们总会比我们更聪明的。

□ 寄自中国

~~~~~

【各抒己见】

一位当年红卫兵的述说

• 许志林 •

有人把在网络上对恐怖事件幸灾乐祸的“爱国者”比作红卫兵，我，一位当年的红卫兵，写下了如下看法：

在《一个中年人是如何认识美国的》一文中我已说过，因为自己的出身成份好（工人），在1966年，十五岁的我也成为一名红卫兵。在这里，首先要明确一个概念，当年的红卫兵可不是人人都能当的，更不是你想要求进步就能当的，其最大的关键在你的父母，如果你的父母属于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军人、革命干部等红五类，才可以当。而如果你的父母属于“地、富、反、坏、右”，俗称黑五类，那么，你就是“狗崽子”，不但当不上红卫兵，还要担心红卫兵会不会来抄自己的家，给自己的父母带上高帽子，挂上牌子游街，甚至遭到毒打。

现在看来，这种出身成份论是愚昧落后的“印度种姓制度”在中国的翻版，是每一个具有平等自由民主思想人都不能容忍的。顺便说一句，一些现在的年轻人居然怀念“文革”，我首先建议他先回家查查自己的祖宗三代，看有没有地富反坏右之类，不要等到文化革命起来了，红卫兵首先跑到你们家里去抄家。

应该说，红卫兵头脑如此简单，完全是十七年教育的产物，因为当时我们所受的教育，就是我们的敌人遍天下，资本主义国家都是我们的敌人，而美国是资本主义国家总头子，当然是我们中国最大的敌人，苏联也是我们的敌人（因为当时它已变成了修正主义），中国在世界上到处都是敌对的国家，大概只剩下阿尔巴尼亚、朝鲜、越南等几个友好国家。而且我们还被告知，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受苦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需要我们去解放。

所以，在1966年的夏天，当毛泽东开始支持红卫兵、并于8月18日第一次接见红卫兵代表之后，红卫兵运动就在全中国大地上蓬蓬勃勃地展开了，抄资本家的家，烧所谓的封资修书籍，以及给所谓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戴高帽、坐飞机，游街，甚至毒打，都是当时红卫兵运动的组成部份。

今天我才明白，红卫兵的这一切举动，无疑都是一种反人类，反文明社会，丧失理智的疯狂的行为，应该予以坚决的批判、清算。但是，应该看到，红卫兵之所以能干成这些违反宪法的事情，是与当局鼓励、怂恿分不开的。抄一个普通公民的家是一种违宪行为，但是却没有听说全国有任何一家公安机关予以制止。当然，当时也不可能。因为毛主席坚决支持红卫兵的这种所谓的革命行动。

然而，红卫兵的行动是真诚的，因为在多年的思想灌输下，我们确实真诚地认为这些地富反坏右分子有罪，家里藏着变天帐，时刻想颠覆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

另外，我还想指出一点，红卫兵不同于后来社会上的“造反派”，红卫兵是由学校里学生娃娃组成的，比较单一，而后来的造反派成份复杂，那些成年人往往会打着革命口号，背后却有着私利的动机。而红卫兵却真诚地相信着毛主席所发出的一切指示。所以，等到1968年，毛主席发出一道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们这些红卫兵也就没有二话，打起背包就出发，并自觉的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言行是一致的（产生怀疑是后来的事）。

看到现在一些反映文革的电视剧，把红卫兵描绘成凶神恶煞的模样，这一点我是不同意的，因为我觉得，当年的红卫兵无论是在抄家、以及其它一些革命行动中，其内心都是真诚的，脸上都应该泛着一种宗教徒般虔诚、圣洁的光（因为他们时刻准备着为所谓的革命理想奉献出一切）。如果以后有机会，大家不妨看看1966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八次接见红卫兵的电影纪录片，看看那些闪着泪花，挥舞语录本、高呼“万岁”的学生娃娃们……

所以我甚至觉得，把现在这些在网上幸灾乐祸，口声声反美，自称是坚定爱国者的网友，把他们称作红卫兵还是抬举他了，因为现在这些人是一种卑鄙的机会主义者。正象一位网友指出的：“这些爱国者坐在麦当劳里，喝着可口可乐、看着美国大片，享受着电脑网络等高科技成果。如果有获得美国留学签证的机会，他会跑得比兔子还快地跑向美国大使馆。……完全是一种卑鄙小人行为。”

打个比方说，当年的红卫兵像那些劫机撞楼的牺牲品，而现在的幸灾乐祸者像拉登。

我为中国教育出这样的下一代感到深深的悲哀！


~~~~~  
【传诸后世】

我编《文革书信集》

• 徐 晓 •

1992年，杨健为撰写《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一书，通过朋友找到我，希望我能提供一些当年读书沙龙和地下诗坛的资料。为此，我将自己多年来珍藏的一些书信和手抄的诗文找了出来。

其中有相当一部份是赵一凡的遗物。一凡生前曾经致力于民间诗文的搜集和整理，1988去世时大量资料都散失了，只有很少一部份保存在我手里。还有一些是我当年被捕后被公安局抄走，释放时又归还的。粗心的办案人员将信件清单也一并给了我，清单上有一栏记录着邮检的日期，我从中得知对我的侦察在我被捕的半年前就开始了。那时的通讯手段除了信几乎就没有别的，当时我们一边似乎很有经验地意识到信件可能已经被拆看过，一边又不得已地在信里互相提醒，好像我们真的有什么阴谋似的。公安局据此断定我们是反革命集团也未可知。出狱后家里人向我讲述抄家时的情景，除了柜子、抽屉、被子、床垫以外，连厕所的水箱和厨房的烟道都搜遍了，据说还带了专门的照明设备，说不定按他们的预想能在我家搜出电台或者武器。时间是深夜，在同一个时间我在另一个地方被捕。那时的荒唐是一般人的想像力难以企及的，使得像《红岩》等小说里描写的地下党的故事都黯然失色。正因为如此，多年来，不管房子多小，我一直带着它们。这些文字跟着我辗转了一处又一处住所，它们像是我的压仓之物，使我成为一个有历史的人。

没想到，事隔多年，重新翻拣那些已经发黄的笔记本和发毛的纸片，我仍然能一页一页地读下去，直到深夜，直到黎明……

这次阅读，促使我重新考虑一凡多年努力的意义。它们的价值何在？生命力何在？作为一凡最信任的朋友，我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除了内疚和惋惜，还能做些什么来弥补这遗憾和损失？这成为我不久后开始搜集并编辑文革书信的契机和动力。

真正付诸行动，还是因为认识了罗亚旗。他以出版社的名义正式向我组稿并且签定了约稿合同。那是1993年初，我正被家庭的重负所困扰，回想起来，在那种情况下决定做这样一件沉重而繁琐的事情，实在是有点不可思议。我的朋友王捷和罗亚旗参与了最初的征集行动。他们俩人都是爱睡懒觉的人，尤其王捷，完全是黑白颠倒，一年中他大概没有几天能在中午12点钟以前起床。我们相约9点钟在万寿路地铁站集合，他俩没有迟到简直可以说是奇迹。那天是去陕北知青王克明家，他们夫妇保存了插队时的所有往返信件。我们读了一整天，选了二十多封信到街上去复印。至今还记得那天的感觉，就像一个淘气的小女孩旷课，和两个大男孩跑出来玩。

◇ 难得的，未必是美好的

本书辑录的信件，涉及到文革初期的派性和武斗，知青上山下乡和返城，五七干校、牛棚、监狱等方方面面；涉及到的书籍，从古典文学名著、马列经典到现代哲学、黄皮书、灰皮书、手抄本和《圣经》；涉及到的人物，有老红卫兵领袖李冬民、《红卫兵战歌》的词作者阎恒、在缅甸战场牺牲的张育海等精英，有朦胧诗人北岛等边缘人，还有在文革中落难的作家严文井、

画家廖冰兄等。有些描述了生命中的重要时刻，比如，《野火春风斗古城》的作者李英儒（1975）的四封家信，详细地记录了他释放前盼望与亲人团聚那分分秒秒的迫切，与亲人团聚后婆婆妈妈的体贴。有些记录了精神求索的轨迹，比如，戎雪兰（1968）、何维凌（1970）等人致潘婧的信，潘婧的长篇附录《心路历程——文革中的四封信》，对于年轻时精神启蒙和发育的过程进行了极为冷静的梳理。赵振开（北岛）致金波（1972）的信中所表达的怀疑精神，已经可以看出与此后的著名诗篇《回答》一脉相承的思考。有些是一段刻骨铭心的情感关系，比如，1972年及1976年张华与刘小布的通信，其背景是，经历了革命时期的爱情并终于成为相濡与沫的夫妻；邢晓南致杨健的信（1975），特别是杨健的长篇附录《怀念阿南》，追述了与亡友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友谊，以及影响其一生的深刻的精神关连。还有一些是对社会政治问题的严肃思考，比如，卢叔宁致丁东（1973）、于首三致赵一凡（1972）、路谊致孙海（1972），对于社会政治问题的讨论不管是否足以深刻，起码显示出一代人的赤子之心。

遇到过一封特别意味深长的信。写信人在文革中被当作“5.16”分子关押了7年，女儿生下后两个月，直至上小学都没见过面。在最绝望的时候，她想到过死。经我多次说服，她将当年藏在墙缝里保存下来的遗书复印后给了我。遗憾的是，像蚂蚁一样小的字迹完全无法辨认。我请求她“翻译”，在我的反复劝说下，她也反复地考虑，最终还是收回了允诺。那是一块伤疤，我又怎么忍心去揭！

著名儿童文学作家严文井夫妇，从五七干校写给在内蒙古插队的女儿的信，看起来极其平淡，细读却意味深长。一家人天各一方，为了能在国庆节时团聚悉心筹划，两代人从南到北从北到南，除去路途上的时间，重合的时间只有一天，而且前提是得确保女儿请两天假能够得到批准。我不知道他们的计划是否实行了，如果实行了，他们怎样将一年或者几年的离别之情浓缩在一天的宝贵时光？这种让人欲哭无泪的悲哀，在许多信里都有反映。

曾经用一年时间写作《野火春风斗古城》的军队作家李英儒，用8年时间在北京著名的秦城监狱反思改写了的人生。他在得到释放几小时后，给妻子和儿女发出8年来的第一封信，信的结尾特意用括号注明“我已经戴上手表了！”“再过三个小时我就可以坐上火车了！”。61岁的中医大夫由于不堪忍受在三伏天反复被批斗而自杀，他在遗书上详细地交待了自己的遗物：图书送给医院图书馆；三件破旧衣服、几把扇子、一个水烘炉交岳父收用；还有互助福利金2元、菜饭票2元、现金6角1分。这些细节读后使人颤栗。

我在征集信中描述了自己阅读老书信的感受后，写了如下的话：“我的同样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朋友们，如果你也有这样一个夜晚，该会和我一样沉浸在回忆中，仿佛自己仍然年轻而幼稚天真而美好，当你轻手轻脚走过你们已经熟睡了的儿子或女儿的床前，他们的成长向你提示着时间的恩惠或无情，你会用成熟、理性的眼光审视自己走过的道路，你会有伤感，也会有欣慰和满足……你不觉得这种经验很难得很美好吗？”

然而，随着搜集到的信件的增加，我越发觉得这段话的空洞和肤浅。事实上，那个年代的私人信件，对谁来说保存下来都是难得的，但回味起来却未必是美好的。

◇ 但愿不是历史的局限

编选这本书的原则是尽量在平民百姓中搜集信件，试图从中挖掘出所谓民间思想。在大约两年的时间里，共搜集了三百多封信，入选的有一百多封。像近年来其他一些研究文革的文章、图书一样，其中有鲜为人知的事件，有催人泪下的故事，也有超前的思想和反叛的勇气。但遗憾的是，具有反叛意味的言论，大多都在政治的社会的层面上，少有在思想的文化的面上的

展开。例如：将中国的社会制度与苏联的社会制度进行比较（于首三致赵一凡 1972）；对社会主义制度产生怀疑，但依据却是修正主义（李南致陈彬彬 1975）。

这只能说明，在一个专制的环境里，百姓往往只能在主流意识形态的框架里思维，所谓民间思想常常只是对主流思想的回应，并不能等同于独立思想，虽然其中一些反主流的因素，由于不具备公知 d 的语境，也会相对萎缩，很难具有鲜明和系统的个性。

高压之下，勇气是罕见的，如同荒漠里的绿草是罕见的，因而是特别值得赞赏的。在颠倒事实、无视常识的社会，如果只有一个张志新能够面对真相，如果只有一个遇罗克能够道出常识，他们当然是当然的英雄。但是民众如果不能意识到这是我们民族的悲哀，便没有资格因他们而感到自豪。简单或者极端地说，假如中国有更多的张志新、遇罗克，也许就不会有十年的浩劫；我们的民族失去两个英勇的战士，却会减少成千上万个冤魂。我们赞美荒漠中的绿草，但是不得不承认，荒漠里长不出大树。如果衣着、发型与众不同都能成为批判斗争对象，在亲朋好友中对时局有所置疑、对某位大人物稍有不恭都能成为反革命，哪里还有思想的空间和思想的勇气？当年被当作反革命集团重犯的我和我的同案们，不过就是议论和传播了一些小道消息，既没有严谨的学理也没有深刻的思想，甚至谈不上足够的勇气。我们的被关押只能证明专制的荒唐。

本书中不乏思考之士、有识之士，但是毕竟太缺少思想的营养和必要的资讯。全书一百多封信中所涉及到的书也就几十本。萨特成名于二十世纪 30 年代，50 年代其存在主义哲学已经风靡整个西方社会，成为一代青年崇尚的人生哲学。但是到了 70 年代，在中国由知识分子子弟组成的读书圈子里，知道萨特其人和学说的也只是凤毛麟爪，其中只有一个人提到了《厌恶及其他》并且说：“我仍然不觉得自己了解了萨特的东西。”

从开始搜集、编辑到终于出版，我的遗憾在不断地加剧。制度的变革可以靠机制和突发事变来实现，我相信这只是时间问题；而观念的革命却需要思想的力量，并伴之以文化的建设。这显然更本质因而更致命。但愿这遗憾只是编者的局限而不是历史的局限，毕竟还有更多的人在做更有价值的挖掘，历史的边际也不是随手就可以触摸到的。

所以，我希望读者不要期待这本书能辑录多少深刻的思想，应该看重的是它的实录性质。我相信，不管多么悠久而宏大的历史，总是靠点点滴滴锁碎碎的个人记忆和记录来完成的。每一个人的每一封信都可以考证出独特的个人化情境，但汇集在一起时，信件与其他文字形式相比，其绝对意义上的原创性可能展现出真实而丰富的社会状况和生活场景。为未来的学者提供比较和判断的依据，为未来的思想者提供自由思想的材料，是这种搜集和整理工作的意义所在。

◇ 奈何得了谁

几天前，清理这本书的原稿，儿子在一旁问：“好像我上幼儿园时你们就在编这本书，怎么我都小学毕业了才出版？”

我和李南相视而笑却无言以对。的确，本书从编辑到出版历时 8 年，那时他才 4 岁。绝非本人具有足够的韧性，也不意味着这件事不值得用 8 年时间去做。事实上选编工作只用了两年时间，惭愧的是，由于其间几易出版者，使我自己对于最终能否出版产生了动摇。我需要检讨的是，如果在以后的 6 年继续搜集，今天献给读者的该是一本内容更加厚重的书。对于保存了多年的信件，每个当事人都很在乎，有些人不愿意提供，能够提供的又几乎都不愿意出借原件。经王捷介绍，我到住在建国门附近的张爱萍家取信，那时她是光明日报记者，她将十几封信都

重新打字并且写了非常详细的附录；何志云的信是抄在笔记本里的，好几千字也是自己打字腾清的；牟敦白的情书都很长，几乎像是一篇篇文学作品，我们是写了收条复印后马上还给他的。不管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出版，不管信的内容是什么，作为生活的见证，每个人都很慎重。所以，我没有继续做不是怕自己白费时间精力，而是怕不能出版无法向支持者交待。

与我签了约稿合同的出版社不明不白地退了稿，不是因为不够出版标准，也不是因为稿件没有做到齐清定，只是缘出无法言说的出版“禁忌”。对此，我没有试图与任何人理论，也没有试图索要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的退稿费。像许多作者一样，我们不得不习惯于接受现实。当年罗亚旗向我约稿时，我只是他的一个作者，结稿时我已经成为与我签定合同的这家出版社的一名编辑。以编辑的身份，如果我约的书稿和当年罗亚旗约我的书稿一样遭到这样的下场，我的作者来和我讨论除了战争、自然灾害这些国际社会公认的理由，该如何解释“因不可抗因素不能出版”

这种条款，并以此索要退稿费的话，我一定会认为这个作者不通情达理。也就是说，接受是惟一的选择，编辑要接受，作者也要接受。当然，我的通情达理并不是由于身临其境，即使我仍然仅仅是一个作者，又奈何得了谁？

当年的《文革书信集》改名为《民间书信集》终于要出版了，有朋友感慨说：这几年此类史料性的书出版了许多，如果是五年以前出版效果一定会更好。我想从市场和社会效应来说这一定是事实。但是，从历史的角度看，什么时候出版都不能算晚。8年只是一瞬，文革至今三十多年，也不能算长。这话由我自己来说有点阿Q，但我不知道如果不这样说，怎样说才能使自己更像一个成人，一个成熟的人，才能使自己活得比较心平气和。

~~~~~

【重建历史】

“文革手抄本”与民间阅读

• 解玺璋 •

现在常有以怀旧为理由将“文革”中的某些作品拿出来招摇的，比如所谓“红色经典”的复排复演，被很多人说得神乎其神，说穿了不过是想利用当下某种畸形的社会心理赚一把钞票。另外，它还可能对人们认识“文革”，重建关于“文革”的历史记忆带来极其恶劣影响。实际上，我们已经从很多地方看到了年轻一代对于“文革”的误读。

于是我觉得，“文革”手抄文存《暗流》能在当下出版，就有了“拨乱反正”的意思在里面。现在很多人喜欢说原汁原味，而这本书恰恰是在原汁原味上下了功夫。近年来，我们陆续也见到一些所谓的“文革”出版物，可惜是被人改写过的。我想，这些改写过的东西，它的文本价值还能剩下多少呢？实际上，它已经不能被认为是“文革”的文本了，这是令人感到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暗流》却有些不同，它基本上保存了抄写者当年抄写下来时的原貌，叙事和文字很多地方都保留了口头文学的痕迹和特征。这一点我们在阅读的时候就应该可以感觉得到。我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那时在工厂里，讲故事是我们最经常的消闲娱乐活动，有些故事我还给同事们讲过。所以，当我们现在回过头来重新阅读这些故事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怀旧的情绪在里面，于是由此及彼，想到自己的青春已在岁月中流逝，生发出一些伤感来。这都是极有可能的，但肯定不是最重要的。

民间的文学和民间的阅读总是在社会的底层流动，它是社会精神文化的一道潜流，也是奔

腾着社会原始欲望的地火。很多年来我一直以为，后人利用文字重建历史真实性的可能几乎是微乎其微的，但那个时代的文学，特别是民间文学，则往往能提供那个时代真实的社会心理潜影。有人曾经说过，要了解一个时代，最好的办法是读那个时代的文学。我想这其中应该包括民间的文学。有很多时候，民间文学和民间阅读是被排除在历史记忆之外的，它所拥有的大量社会心理信息也就因此湮灭并丧失了。只有很少的时候，有人发现了它的价值，从历史记忆的深处把它发掘出来，公诸于众，可谓功莫大焉。

白士弘先生所编《暗流》一书，就是这样的一件善举。《暗流》的出版使30年前的民间文学读本在当下重新进入了我们的阅读空间。当然，它的历史文本价值明显地高于它的文学价值。通过阅读这些作品，我们几乎可以真切地触摸到生活在“文革”中的民众的精神脉搏，触摸到那个时代的精神“软肋”。这在当下“文革”研究几乎停滞不前的时候，差不多是给这种集体的麻木不仁注入了一针兴奋剂。特别值得提到的还有，书中收录了周京力先生对几位手抄本收藏者的访谈，他们对当年的描述虽然只能是一种对以往生活经历的追述，但是，对于重建“文革”历史记忆来说，这种来自民间的、现实性的个人情感记忆，有时反而会体现出它的不同于群体记忆的价值。它的存在提供了现实通向历史的纵深角度，对研究“文革”群体记忆的演变应该是有所帮助的。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吕青（加拿大）	熊波（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hxwz@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